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大学该不该有“科研型教授”

■郭英剑



教授就是教授,教学与科研是其义务,也是其工作职责所在。无论“教学型教授”还是“科研型教授”,这样的分类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考虑可以理解,但从长远来看,并无太大必要。

与“教学型教授”相类似,“科研型教授”也是近年来在高校中较为流行的一种高级职称类型,主要偏重于科学研究而不从事教学。最近,国内有关“教学型教授”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与焦点,由此引申出对教师职责、教学评估以及职称评审制度的反省与审视,我认为这很有必要也十分有益。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还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高校中该不该有“科研型教授”。

我个人观点是,教授就是教授,不必再做过多的分类。如果承认大学教授是一个从事教学、科研和在校内外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那么,高校中就不应该出现“教学型教授”,也不应出现专事科学研究的“科研型教授”。

在这里,我想对比国内的“科研型教授”与美国高校中相似的设置“研究教授”,以此说明何以不必有“教学型”与“科研型”分类的缘故。

何谓“科研型教授”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师职称系列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但很多高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又根据教师在教学中、科研等方面侧重承担的主要职责,将教师岗位做了类型分类,分别为教学科研型岗位、教学为主型岗位、科研为主型岗位。我们就以某高校为例来谈谈这些分类(这样的分类在全国大同小异)。

这三者的定位与区别大致如下:“教学科研型”岗位是指从事专业教学、专业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教师岗位;“教学为主型”岗位是指主要从事公共课或通识课、实验课、对外汉语教育课程、成人教育课程教学的教师岗位;“科研为主型”岗位指在校属跨院(系)研究机构、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以及经学校批准的其他单位中设置的以承担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教师岗位。

美国高校教授类型

美国高校有着复杂多变的职称名称,今天主要谈谈专事教学的教师与专门从事科研的教师。在一些高校中,会有专注于本科课程教学的个人而不从事研究,他们可能也被人称为“教授”,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授”。一般来说,“讲师”(Lecturer)或者“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就是通用的称号。

“讲师”既有全职,也有兼职职位,但通常都不涉及任期,也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义务(尽管有时他们自行选择进行研究),有时候会涉及行政服务角色。“讲师”通常教授本科和/或入门课程。这是高校节省成本的一种措施。因为与终身职位相比,讲师的工资较低。在一些大学中,“高级讲师”主要指有一定成就的讲师,有些高校也将其称为“教学教授”(Teaching Professor),他们并无进行学术研究的义务。

美国不少高校有“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之职,与我们所说的“研究型教授”相近,通常只承担研究职责而没有教学义务。但绝大多数的高校中,“研究教授”均不属于“长聘制”(tenured,也就是有人所说的终身制)系列,他们没有资格获得长聘制任期,并且必须从校外获得研究经费或补助资金,因为他们不能获得来自所在高校的定期工资。

由此可见,以科研和学术研究为主的“研究教授”通常是非终身职位。他们无需教学(虽然有时候也会教),以研究为主。通常他们必须通过从校外获得的研究经费或者补助金而获得研究薪水。如果他们没有研究经费或者补助金,那么他们就得不到报酬。

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几所美国高校对于“研究教授”的规定。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教授”。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所谓“研究教员”(research faculty)指的是被任命为研究科学家(research scientist)和研究教授系列(research professor track)的人员。“研究教员”属于教师成员(faculty),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研究而非教学。但研究教员的任命不属于终身教职系列(tenure track)。

密歇根大学鼓励“研究教员”按照其研究职责参与一定程度的教育教学活动。他们可以以教学部门安排或者参与研讨班、课程和研讨会,也可以协助学位论文候选人或博士后人员的研究工作。

由此可见,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教员”属于“教师成员”,但不属于终身教职系列人员,不能获得终身教职系列的任命。他们虽然以学术研究为主,但也可以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教授”。康奈尔大学明确规定,“研究教授”职称仅适用于长期的非长聘制(non-tenure-track)教职人员,这些人是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

经验丰富。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开展新的研究活动;创建和管理研究实验室;寻找研究经费,提交项目申请书,履行研究计划合同;规划、实施和报告原创性研究等。“研究教授”一般是各个研究项目和基金项目的课题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s)。

拥有“研究教授”职称的人员不得教授学分课程。如果相关系部要求他们讲授学分课程,那么,该课程必须与其研究项目相一致,并且要得到所在学院的院长批准。同时,对于这种教学,要禁止将教学费用不恰当地转移到他们的研究基金中或者合同中。而且,这样的教学状态只能是暂时的,不得持续教学。

“研究教授”不是大学的教师人员(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Faculty)。除非获得特定教员的投票权,否则他们无投票权。一般来说,要想获得“研究教授”的头衔,需要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所独立承担的科研项目已经启动,并且已经让人看到了可以获得高水平成果的希望。

由此看到,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教授”既不是大学的教学成员,自然也不在长聘制系列之内。他们一般是各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他们只从事研究,未经批准,不得进行学分课程的教学工作。

哈佛大学的“研究教授”。哈佛大学的“研究教授”有所不同。在相关规定中,“荣誉教授”(Professor Emeriti)与“研究教授”放在一起。

根据哈佛大学文理学院(FAS)的有关规定,“研究教授”的称号适用于有资格获得或已经持有退休身份的个人。教授一旦退休,即可获得此称号,可以连续保留五年。之后,如果该教授还想保留此称号,而不想用“荣誉教授”这样的常规头衔,那么,他应该每年写信给文理学院院长,说明来年的研究计划与研究活动,获得批准就可以继续使用“研究教授”的称号。否则,“研究教授”的头衔将在五年期满后,自动恢复为常规的“荣誉教授”。

由此可见,哈佛大学的“研究教授”与其他高校的有很大不同,这一称号所赋予的更多内容是一位教授在退休后“还在从事学术研究”。

划分“教学为主型”与“科研为主型”并无必要

进行中美高校之间的对比,其中至少有两点一致之处。首先,美国高校的各种明文规定都很清楚地指出,研究(research)和教育(educat-

ion)是长聘制教职(tenured)和长聘制教授(tenure-track professor)的主要任务之一。这里的“研究”与“教育”其实就是我国高校所说的“科研”与“教学”,这两者缺一不可。其次,教授们所花费的研究精力或教学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处机构的类型。这一点,中美高校并无不同。换句话说,作为全职教师,教授自然要从事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指导,研究和教学是教授们的三大任务,也是他们的职责与义务。

我个人以为,虽然“教学为主型教授”(或者“教学型教授”)与“科研为主型教授”(或者“科研型教授”)在我国的存在都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也表示理解,但从总体上看,这样的分类并无必要。

首先,无论从词义还是从职责上,都没有必要将“教授”做细致划分。既然承认“教授”的职责是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那么,这三者的责任就应该是平等而不是有所区别的。以教学与科研这两项为例。所谓“平等”主要是指内涵而不是数量,即“教学”与“科研”两者可能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但不能有所偏废。比如,一位教授应该上课,那么他达到了规定的最低课时量,这就可以说是满足了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但绝不能不上课。对于科研的要求也是一样,一位教授的科研工作量,应该达到规定的最低要求,哪怕达不到,也至少应该由自己所感兴趣或者所从事的科研工作,而不能一点科研都不做。这就是两者的平等关系。

其次,从逻辑上看,“教学型教授”和“科研型教授”的出现,将教授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教学科研型教授”似乎当成了两项全能冠军,好像只有他们的教学科研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却忽视了他们为教学与科研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而当人们在热烈讨论“教学型教授”的出现是对教学效果好而没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鼓励与奖励时(再重申一下,这样做并没有错),对于“教学科研型教授”来说,无形中似乎是在暗示他们的教学效果并没有那么好,或者教学效果两者都不是平平而已。

其实,事情很简单,“教授”就是教授,就是在课堂内外指导学生传授知识,教学与科研是其义务,是其工作职责所在。专事“教学”与“科研”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但着眼未来,这样的设置并无太大必要。

四海游学



Peter Ballentine (后排左四)与历史助理教授 Zach Fredman 和同学们的合影

我是 Peter Ballentine,来自美国,如今,是昆山杜克大学 2022 届的一名本科生。

高三那年,我第一次有机会和杜克大学的博士生们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升入高三前的那个暑假,在学习了一些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的知识后,我开始定期到杜克大学的实验室报到,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

我们当时所做的研究是关于检测轮胎胎面深度的印刷传感器以及由液态金属制成的可拉伸电子设备。尽管加入项目进程已经过半,我仍努力做出了贡献,这使得我最终被列为项目论文的联合作者之一,而这篇论文最终发表在了《美国化学学会·纳米》(ACS Nano)上。

我们发现,由印刷碳纳米管和液态金属制成的设备和由印刷碳纳米管制成的设备在性能上几无差别。这预示着可拉伸电子设备具有很大的未来前景。

大约同一时期,我需要为自己的大学去向做出最终选择。那时,我一共申请了 13 所大学,也收到了多所全美顶尖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昆山杜克大学是我申请的唯一一所美国以外的大学,就是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独特学术环境。

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这样的:它能为我提供继续做研究的资源,让我习得独特的技能,助我不断进步。

我参观了自己感兴趣的每一所大学,还特地从美国来到昆山杜克大学,参加国际生的校园体验活动。在美国,每次校园参观都大同小异:新生们彼此并不交流,带领参观的人则会“吹嘘”学校标准化考试成绩之可观,再向我们介绍一些听起来意义不大的人文传统。

在所有这些大学里,昆山杜克大学一下子吸引了我。这所学校的校园体验活动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到达机场时,许多未来可能会和我成为同学的同龄人主动和我打招呼、介绍自己,他们都是独自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我们一见如故,这种感受完全有别于从前的大学体验活动。

正式开学后,我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昆山杜克大学这种不受限于典型大学模式的风格。在全新的环境中,同学们很快就熟络起来,师生间的联系也无比密切。

每个人都期望在昆山杜克大学获得成功,每个人都在努力向这一目标迈进。

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参加与校领导的“焦点小组”座谈会,就从校园文化到课程设置的各个方面发表看法和建议。通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学生的意见被充分听取,学校也会根据我们的反馈做出调整。而这时,我还只是个大一新生,我想其它任何大学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比如,学校自然科学的课程体系就在第一年中根据学生们的反馈意见做出了很多调整,尤其是为期七周的《综合科学》基础课。课程涵盖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自然学科的内容,由于同学们在每个知识领域的掌握程度不一,而且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上课前很好地吸收课程材料,导致我们的学习困难重重。因此,我们提出了反馈和改进建议,校方很快调整了这门课程的内容和授课节奏。目前,新版课程已经进行了一个学期,初期反馈良好。

在昆山杜克大学,同学们永远忙碌碌碌。每个同学都可以创建社团、从事校园工作。但即便如此,一周四天的学习安排也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例如,参与校外项目、参访企业、去苏州或上海旅游,甚至只是休息放松一下。

闲暇时,我和杜克大学的合作研究者一起,继续完成另一篇有关印刷传感器项目的学术论文。我们制作了一系列印刷传感器,每个传感器都可以跟踪轮胎的胎面深度,并制作出某种轮胎的行驶地图,以及轮胎在不同点的磨损程度。

相比于第一篇论文,我不再是单单做出一些贡献,而是更多地投入项目研究,并大量参与了论文的写作和编辑。最终论文在《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传感器》(IEEE Sensors Journal)上成功发表,我被列为了第二作者。

这篇论文的发表并不容易。当我从昆山杜克大学放暑假回到美国,并再次回到杜克大学的实验室做研究时,这篇论文仍在审稿阶段。大约在我回美国后一个月,论文终于发表了。从开始动笔算起,整个发表过程历经一年的时间。现在,我正为我们的设备打印准备墨水,并创造一个全碳晶体管。

我热爱在杜克大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但我同样期待将重返昆山杜克大学兴奋不已,这让我再次投入到疯狂、美妙又刺激的世界。

我在中国的大学生活

■Peter Ballentine

在没有到来之前,老挝在苏州大学同学们的印象中是被时光遗忘的地方,原始而古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我国赴老挝旅游、经商的人数不断增加,现实中的老挝还是想象中的那样贫穷吗?“一带一路”倡议为它带来了哪些改变?

带着这些问题,日前,由 38 名苏州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组成的中国大学生“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体验团到达老挝首都万象。这是由老挝苏州大学和苏州大学国际交流处主办、依托苏州大学老挝—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研究中心组织的大学生老挝文化体验活动。

“我们希望中国高校青年不仅要把游学的目光盯着欧美发达国家,更要关注欠发达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关国家。作为未来脊梁的高校青年,要紧跟国家发展的方向,勇挑重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老挝苏州大学副校长黄兴说。

十天体验

十天体验学习中,同学们听取老挝历史经济发展、民族文化、风俗节日等方面的讲解,体验老挝语学习课程,进行老挝国情研究和实地考察,通过所见所闻亲身感受丝路文化发展。

其间,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参赞覃晨向同学们畅谈中老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引用近些年中国人在老挝投资建设的数据资料表明,中国为老挝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我们祖国积极承担着国际责任,提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带一路’倡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影响力和大国作为。作为苏大学生的我们应该积极响应,认真履行中华儿女的担当,

“一带一路”高校行动

老挝十日行

■本报通讯员 姚臻 黄郁健 记者 温才妃



苏大学子走访桑园、走进织布村

为学校和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参加学习体验后,2017 级商学院学生许寅潇深有感触地说。

从课内走向课外,同学们还实地参观了由老挝科技部、苏州大学等方合作的现代蚕桑产业发展示范项目,见证科技改变农业的现实力量。同时,他们还走进中国在老挝唯一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赛色塔经济开发区和中老铁路万象段建设现场,实地感受中国与老挝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实际上,交流是双向的,不仅有“走出去”,还有“请进来”。

从 2018 年开始,老挝苏州大学举办“丝路青年中国语言文化学习体验营”,每年从老挝当地报名的学生中选拔 20 名左右的青少年学子到苏州大学进行近一个月的学习,通过汉语、书法、剪纸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以及苏州当地的生活体验,帮助他们全面地了解苏州民俗文化,感受中华文化

的悠久历史。

中国影响

夏日午后,万象的气温常常达到三十五六摄氏度。

在水电十四局联合体磨万铁路修建工地中,每天都有十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拿着工程图纸“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顶顶安全帽下,铁路建设工人们的脸上不停地滑下一滴滴汗水,忙着工作的他们无暇擦汗。在他们手中,将立起 154 座桥梁,打通 76 条隧道,建成 31 座火车站,完成老挝历史上最大的工程项目。

据悉,援建队伍着重利用当地的人地资源,聘用老挝员工,诠释了这是一条象征人文、友谊的铁路,是中老合作共赢的标志性项目。除此以外,在施工过程中,援建队伍特意加强老挝员工对这项工程的认识,让他们从工作

中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苏州大学 2018 级医学部学生郎朗在参观后感慨道:“实地参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影响’给另一个国家带来的改变。特别是在中老铁路的建造现场,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事实上,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中国元素早已进入老挝的千家万户。同学们发现:在万象的街道招牌上,中国字和中国品牌并不鲜见;在琅勃拉邦的夜市上,年轻姑娘会用普通话与华人做买卖;还有那些援建的学校、医院、铁路……

中国元素在老挝生根,中国文化也在老挝发芽。实践活动中,苏州大学与老挝苏州大学的双方学生结伴出行,走进万象城的各个角落。在与老挝学生的交往中,来自中国的苏大子们不仅了解到了老挝民众的真实生活,更感受到了老挝学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

虔诚国度

夏风是老挝苏州大学的 2018 级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因家境贫困,他 11 岁时便出了家。虽然布施已能够保证他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对学习的热爱和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止步。在寺庙住持和师兄的资助下,他坚持每天步行 2 小时到学校学习。

老挝是个佛佛的国度,对僧人十分尊重,但也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过午不食,不能自己骑自行车、摩托车,一个人一生只能住同一所寺庙修行等。随着课业的加重,为了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来好好学习,夏风只能选择还俗。他向几位团队成员表达了自己的急切愿望:“虽然现在我的中文说得还不是很好,但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我喜欢中国和中国文化。”

一天傍晚,团队成员一起走进夏风住了 12 年的寺庙。正值僧人诵经之际,大家脱了鞋,跪坐聆听,从老僧人、小沙弥和善男信女的虔诚吟诵中感受着夏风成长和生活的经历,也体会到他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渴望。

同样,其他老挝学生在畅谈未来理想时,他们的话里总离不开“要去中国看一看”这样的心声。

听到这样的心声,让苏州大学 2017 级传媒学院学生秦悦想起社会学、人类学专家费孝通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她感叹:“通过这十天的见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老挝的民族文化,热情、善良、闲适、淳朴,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些老挝人对中国文化的赞赏与向往。世界本来就是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每一种文化都值得尊重、学习、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宣扬本国的文化,这大概就是‘一带一路’的意义。”